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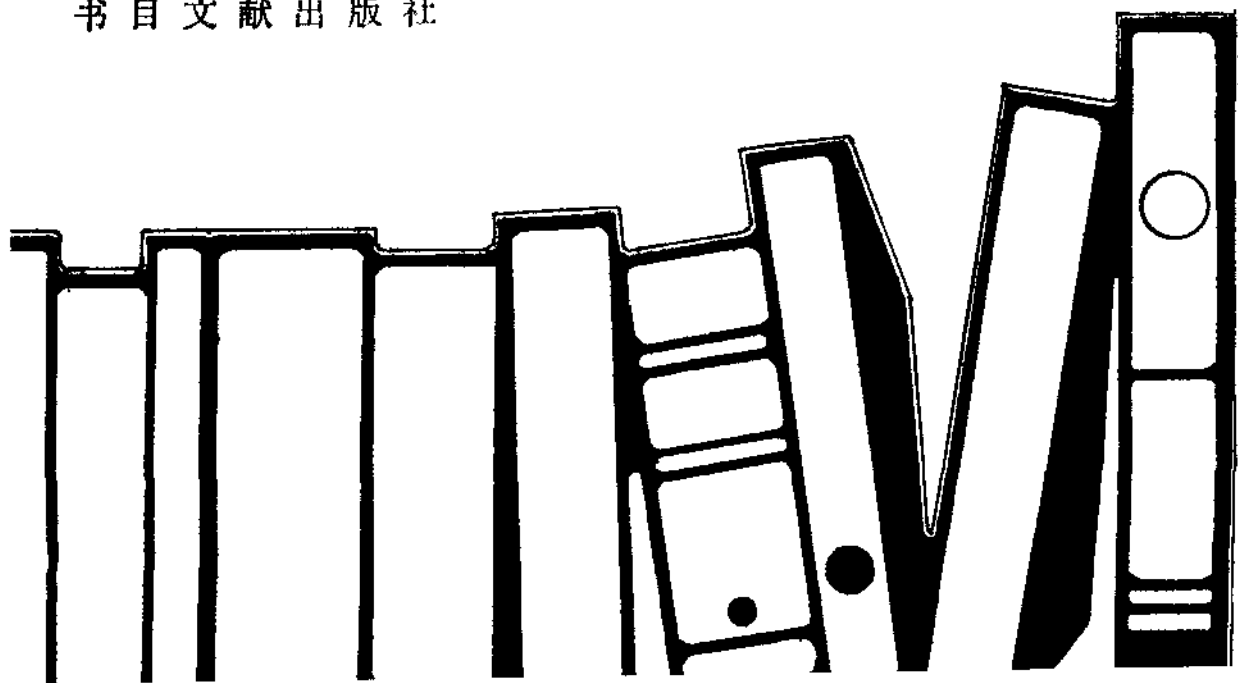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图书馆学 与目录学 研究

第 2 辑

1986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研究(2)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6)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5 印张 128 千字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 7201·102 定价: 1.30 元

〔内部发行〕

東 洋 文 庫

* 廖慶洲 *

日本最大的企業集團，首推三菱，而目前世界上著名的漢學研究機構，如「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等，都是三菱資助創辦的，這也是三菱在經商求利之餘，熱心文教事業的表徵。

東洋文庫藏書有七十萬冊，靜嘉堂則有廿萬冊，主要都是我們歷代的文化遺產。筆者最近赴東京參觀這兩個文庫，見到這些被日本人視為瑰寶的藏書，真是百感交集，幾乎每一本藏書都經過工人細加布面包裹處理，再以統一格式在裏面以毛筆字寫上書名，稀罕的蒙古文經則用布面包裹起來（見圖）。藏書室有完備的溫度、濕度控制裝置與紀錄器，總之，這一切看來都令人覺得這些典籍藏得很好的「照顧」。

這些典藏，以中國人的立場來看，當然翻閱起來，有一種親切感，但是也不由興起這個念頭：為何會流落異國他鄉呢？三菱怎麼會對文庫的設立如此熱衷呢？這背後究竟有那些因素呢？

首先來看東洋文庫的成立沿革，民國六年，曾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顧問的澳洲籍新聞記者喬治·A·莫里遜，將蒐集幾近廿年有關中國問題的歐文書籍、地圖等，計二萬四千冊，以三萬五千英鎊的價錢，出售給三菱創辦人岩崎彌太郎的公子，岩崎久彌。

當時交易的場所是在北京莫里遜的住宅，買賣契約書買方代理人是橫濱正金銀行（今東京銀行）董事，小田切萬壽之助，為了點交這批文冊，當時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的助手石田幹之助，親赴現場，為目錄一一比對照收。

當時裝運情形是：每箱長寬各二尺五寸，二尺三寸，深三尺四寸，厚五寸，總計用了五十七個木箱捆包，先以貨車從北京送到天津，再由三菱旗下的「日本郵船」所屬的「高砂」輪裝載，船一到橫濱後，再由鐵路送到東京柴川的三菱倉庫，為示慎重，日人還透過駐華公使出面，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派遣軍隊，擔當在華境內輸送的警備。

當時此一鼎鼎大名的「莫里遜文庫」運送

到日本，成為世界性的一大新聞備受各界矚目。

何以莫里遜文庫如此有名？他為什麼又與脫手呢？原來莫里遜是英國泰晤士報的東亞特派員，從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以來，即往來於中南半島各地，一八九七年成為北京特派員，專門從事中國與東南亞情勢的報導工作。由於工作上的需要，加上他天生有蒐藏癖，乃廣泛收藏清朝末年，民初的各種史料，加上他的活潑，民國肇造以還，即受聘為政治顧問，年俸達三千五百英鎊，再加上其他收入，總計在四千英鎊以上，相當於薪水的二倍，成為搜購書籍的最大本錢。其間曾為袁世凱調度資金二千五百萬英鎊，名譽上是「國家重建」借款，實際上却淪為袁世凱「帝制運動」的資金，莫里遜為此大感失望，乃有息意去，再加上清朝滅亡後，舉世關心中國的動向，以前可以廉價購得的古本，如今地市場上已經不可多見，相對地，價格也高得驚人。面臨此一情勢，他終於在一九一七年在顧問期滿之際，毅然辭去，而為個人前途著想，乃有出售藏書之計。

由於莫里遜聲望，此一消息一經傳出，有意接手者立即蜂擁而至，其中尤以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朝鮮總督府；等單位機構較為踴躍。日人則以清末民初以來的介入，尤對於漢治萍公司的經營最為處心積慮的橫濱銀行董事小田切，最為關注，並向上級報告，該行總經理井上準之助對此也有相當理解，隨即到東京丸之內商業街的三菱總社辦公室，拜訪三菱的第三代經營者岩崎久彌。早在一九〇一年岩崎以購入英牛津大學穆勒教授的古印度藏書，寄贈東京大學，表現出對東方文物蒐集的興趣，而享有名聲。這一次，岩崎已知道井上的來意，為表示誠意，親到門口迎接井上。兩人談話不到數分鐘，岩崎應諾，如此果斷，就是基於眾多競爭者的考慮。這件事的促成，一直被日本學術界視為東方學研究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從此日本對「東洋學」的研究，隨著莫里遜文庫的充實，而得到大歩的發展。

●位於東京文京區的東洋文庫、告示牌詳述成立的淵源。

井上準之助隨後擔任東洋文庫理事長，也出任過日本銀行總裁，大藏省大臣……等高職，是大正、昭和期的政治家與財界首腦人士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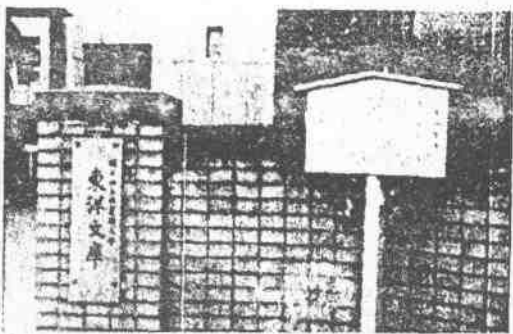
現今的東洋文庫則是以莫里遜藏書為基礎，於一九二四年岩崎氏再捐贈二百萬日幣，成立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戰後則演變成國會圖書館示支部。他個人也另購五千三百部的日本古書，如今以「岩崎文庫」為名，特別典藏在東洋文庫的書庫中。

岩崎久，在父親過世後，由其叔父岩崎彌之助接掌三菱事業。他個人則赴美國留學，一八九一年從賓州大學畢業後，才回日本擔任三菱副社長，二年後，叔父返國，父親就任三菱合資社長。不過，此際仍賴乃叔補助。一直到一九〇八年，彌之助過世後，他才真正發揮領導力量。唯他個性溫厚，辭心文教事業，在位不久，隨即於一九一六年將三菱事業的指揮權讓給他的堂弟：岩崎小彌太。他自己則從事農牧事業，過著優悠的生活。因此，即便在第二次大戰後，財閥遭到解體，家財盡失，但是他仍然在自設的農場與世無爭似地，過著恬靜的生活，因此得享有九十一歲的高齡。

在這些藏書裡，被日本政府列為國寶級的有我唐代書寫的「毛詩」版本、日本儒學家所傳的「春秋經傳集解」、我南朝宋（四二〇—四七九）時代的抄寫本「史記」，日本抄寫我「昭明文選」而成的「文選集注」，我唐代書寫的「古文尚書」……等，此外也有多項「重要文化財」。



●東洋文庫包藏的蒙古文經。



為了活用這些文化遺產，該文庫每年春秋兩季舉辦東洋講學座，每年舉辦一次稀觀書或專門書的展覽會。海外各地亦經常有學者專家前往調閱資料，目前經常駐在該文庫的研究員即有八十名左右。筆者偕手翻閱訪客簽名簿，見到國內、韓國、大陸……等著名大學的教授都曾來過。據該館的人員告稱：平均每天有十四人前來利用。這個數字如果與日本國會每年資助四千萬日幣，文部省補助五千萬日幣，再加上前述聯合國文教組織的補助，總計每年動支經費在一億七千萬日幣之譜，未免顯得「利用率」太低了，但也正顯示知識的可貴。日本人這幾年的經濟發展成就却被人戲稱為「經濟動物」，就是因為貿易摩擦之故，要轉化世人的觀感，憑藉這些文庫，多做潛移默化的功夫才是上策。

日本自一九〇四—一〇五年日俄戰爭勝利以後佔領了我東北，綽壓了朝鮮，日本人氣焰高漲到極點，自認是取代清朝而安定東亞的勢力，日本人的視野乃從東亞擴及全亞洲再擴及全世界。在這種背景下，東京帝國大學則從往常的中國史學科，於一九一一年開辦「東洋史學科」。但是有關藏書，尤其是歐人研究東方問題的書籍則一直相當貧瘠，而風聞莫里遜文庫連十五世紀的「馬可波羅遊記」都有，可見其完備，不禁有見獵心喜之感。

如今東洋文庫對外採取公開方式，不分國籍都可以利用，也提供各種影印服務。由於蒐集的文獻齊備，就一個專題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資料，對於撰寫論文或作專題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環境。

（原載：星島日報〔泰〕1986年5月6日第7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之現況與展望

國立中央圖書館於民國廿二年籌創於南京，抗日軍興遷移重慶，三十四年勝利復員，四十三年在台復館。復館後以藏書遞增，服務日衆，奉准規劃遷建。於七十五年七月遷入現址服務。回顧中央圖書館五十年來的發展，從創館以至遷台，自京而蜀，輾轉台臺，一直秉持保存民族文化，建設現代化國家圖書館之政策，充實典藏，開拓館務。茲值政府大力推展文化建設期間，中央圖書館的業務將隨新館建築之落成邁入一新的發展階段，謹就館務現況及未來發展方向略陳於後，以就教於各界先進。

中央圖書館肩負全國圖書文獻的蒐集、編藏、考訂、閱覽以及研究全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重任。因此，中央圖書館未來的發展不僅要考慮到本身業務的需要，更應兼顧其領導職能。就本身業務而言，今後如何充實館藏，提昇服務，實爲當務之急。中央圖書館之服務兼具文化性、教育性、資訊性及推廣性，其服務要項包括：

- (一)調查、蒐集、整理與典藏國家圖書文獻，徵集世界各國學術名著。
- (二)提供參考諮詢、圖書借閱、讀者輔導、圖書展覽，並舉辦有關圖書利用之各項指導活動。
- (三)編製國家書目，提供書目資訊服務，謀國內外資訊之合作交流。
- (四)辦理推廣服務，如學術講座、巡迴書展，出版品交換以及推展圖書館事業之合作與輔導。

本館除應全力發展上述服務外，並謀積極加強下列各項活動，作為未來發展指標：

(一)配合新館遷建，積極充實館藏、加強服務，以發揮國家圖書館的功能。爲充分利用新館的空間設備，擬在三年內達到藏書百萬冊的目標，並增設各專科參考室，以適應政府、議會及民衆在研究與閱覽方面的需要。館藏發展力求蒐羅齊備各科經典著作，各重要學派及代表性作家著作，以及一般參考工具書；並盡力徵集國內出版品，採訪海外國人學術著作，世界各國出版有關中國研究論著，以及流失海外珍籍文獻；此外並廣爲蒐集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及重要會社團體出版品，及就當前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學術研究及民衆生活調適等方面需要，選擇最新著作。在此館藏基礎上，進而擴大資料流通與參考諮詢服務的層面。

(二)建立全國統一圖書編目作業制度，並加強書目控制服務，謀圖書館事業之合作發展。本館已試行統一編目作業多年，今後爲解決全國圖書館分編工作之困難，並謀全國圖書資源之統合運用，當加強書目控制工作，編印各項專題及聯合書目，研訂統一分類編目標準，以應研究參考及各館編目之需。

(三)推動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謀全國圖書資訊之共享。本館建檔資料包括：普通圖書、善本、期刊聯合目錄，中文期刊論文索引及政府出版品等書目索引檔，同時並將電腦媒體產品、軟體設計

程式等提供國內圖書館界使用。今後擬充實人力設備，建立全國圖書資訊服務中心，發展全國圖書資訊網，以便資訊之交流與利用。

(四)蒐集漢學研究資料，提供研究環境，以促進漢學之研究。中央圖書館於民國六十九年奉行政院核定兼辦「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業務，提供國內外漢學家有關資料性服務，以促進漢學之研究。該中心於加強學界溝通聯繫、倡導研究風氣已發揮相當作用。為謀有效推展中心業務，今後應加強與各學術研究機構連繫與合作，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料與良好的研究環境，使我國成為國際漢學中心。

(五)研究圖書館學術，辦理各項技術研習，以提昇圖書館管理技術與方法。本館為推動圖書館學之研究，經常舉辦學術研討會，以增加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能，改進其管理方法，加強服務效能。今後擬繼續加強以下重點工作：增設圖書館事業輔導中心、圖書館學資料室、並經常舉辦研究性與教育性活動；與國內相關科系訂定建教合作計劃，以增加各館現職人員專業知識。

(六)拓展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以增進國際文化交流。中央圖書館現設有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並與八十個國家建立交換關係，今後擬在現有基礎上謀求發展，擴大出版品交換範圍與對象，增進我國與國際間之文化合作關係；並加強歐洲地區的交換工作，增聘專人負責，以拓展交換關係；此外積極協調國內資

料交換機構作有計劃的對外交換與贈送工作。

以上僅就今後發展計畫中之舉筆大者，擇要說明，圖書館的服務重在圖書資料之保存與利用，而館藏的充實為一切計畫中之首要；尤以國家圖書館具有文化典藏之職能，更應注意及此。惟上述工作當非一蹴而成，必須配合充分的專業人才與經費始能在一定的計畫下分期達成。教育部期望本館在全國圖書館事業發展中成為一個有形與無形的服務中心，並領導全國圖書館事業之發展。實已指明中央圖書館未來發展方向與所承擔之責任，個人深信在政府明確的政策下，中央圖書館的發展是可預期的。

王振鵠

(原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遷館紀念特刊》(1986年9月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的任務

- (一)蒐集編藏國家圖書文獻：依據出版法徵集全國公私機關其版品集中編目典藏；並蒐集歷代典籍妥善整理保存，以謀中國文化之傳佈發揚。
- (二)廣徵世界各國重要出版品：本館採訪政策係以各種學術性出版品為優先選購範圍，尤其着重蒐集各國有關中國之研究論著，以及目錄索引參考工具書。
- (三)編印書目及索引：利用徵繳及蒐集之圖書編製各種書目索引，供備全國圖書館及國內外學術文教機構參考。
- (四)便利學術研究：除一般參考及閱覽工作外，並設置各種專科閱覽室，開架陳列各科專門論著為研究人士服務。
- (五)促進文化交流：本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代表國家履行國際交換協約義務，徵集國內出版品與各國實施交換，此外本館經常參加各國舉辦之國際書展，藉收宣揚文化之效。
- (六)輔導圖書館事業之發展：有關全國圖書館事業之規劃與輔導、促進圖書館館際合作、辦理圖書館人員在職訓練等，均為本館重要職務。
- (七)推展社教活動：為提倡讀書風氣，鼓勵民衆利用圖書館，經常舉辦各種圖書展覽，每年定期舉行圖書館週活動，並督導分館舉辦各項文教活動。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地 址 臺北市南海路43號

電 話 (02) 3147320—1

(原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台〕1986年19卷1期封底2)

如何利用版本學知識以從事 古書的編目工作

吳哲夫

一、前言

圖書是知識的源泉，唯有從圖書之中，才能瞭解知識的發展，知識的內容以及知識的重要。所以古往今來，只要是文明的社會，沒有不對圖書特別重視的。

人類社會，從無知識的階段，慢慢發展，終於產生了知識。爲了傳播知識，於是有語言及文字的發明。語言既不能流傳長久，又無法傳播到遠方，於是人類便使用文字，撰成書本，用來做爲交換經驗，表達思想的主要工具。當人類從簡單的文明社會進步到今日科技極爲昌明的時代，發展的過程是那麼艱辛，又是那麼漫長，這期間不知產生了多少圖書，爲人類文明貢獻了多少的力量。尤其是在紙和印刷術發明以後，圖書生產的能力，一日千里，不但知識隨着快速的普及，而在衆多人類智慧的參與之下，又促成圖書數量及品類飛快的增加。圖書一多，藏書便豐富起來，同時每個人的生命有限，知識的喜好也各有不同，讀書便不能不有所選擇。於是圖書

爲方便典藏與檢尋，便有一套編目的方法產生了。

我國是一個文化極發達又極長遠的國家，自古以來，特別重視圖書的價值及讀書的風氣，先賢不但以「開卷有益」勉勵，同時還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看法，這也就是我們民族能壯大成長爲世界最久又最偉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這種正確偉大的傳統之下，我國古代的書籍，傳世不但最多，而且快速生產圖書的最基本條件——紙和印刷術無一不是我國人所發明，今天只要談到圖書的歷史或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則我中華民族不但居功第一，同時也最光輝榮耀。

二、讀古書爲什麼要注重版本

我國自從春秋戰國以後，在百家爭鳴的情況之下，思

• 吳哲夫先生，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想學術快速的進步，圖書的數量也日漸增多，為方便收藏及檢尋資料起見，開始陸續有簡單的編目方法產生，到了漢代，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七略成書之後，目錄這門學問便奠下了基石。以後漸漸發展，使我國的圖書編目，成為一種特色，那就是偏重於以服務讀書人為對象的四部分類法，以經、史、子、集四部次圖書，其下再分類屬，同一類中所著錄的各書編次的先後，先按作者朝代大分，同一時代的作者再依生存的先後，或科第的先後來排列。這種編目方法，既按學術分野來擬定，又按作者時代來排列，所以要查檢某一類別，或某一時代的作品，甚為方便。此外，著錄的各書，並載明卷數、作者朝代姓名及版刻時地，對於一書的傳存，是全本或是殘卷，是何時代地方印刷出版的，可以一目了然。這種編目方法，從開始到現在已有一二千年的歷史，由於本文目的不在探討古代目錄學，所以對此種編目的長處及演進不擬加以涉及，以節省篇幅。在茲僅就這種編目方法下，為什麼需要標明版本一項加以申述。

「版本」這一個名辭，本來是一個代表兩種意義的連合名辭，「版」是雕版，「本」是指書本，版本也就是雕版印出的書本。「版」因刊雕有先後，所以有時代地域的區別，因此現在一般人把「版本」這一名辭用來形容某一書的雕版時代。其實，圖書除了雕版之外，還有用手抄寫，所以廣義的說，版本除版刻的書本之外，還涵蓋有排印及寫抄等書本的意義。

讀書為什麼要重視版本呢？前面說過，我國是一個文化

極發達的古國，又非常重視圖書，於是一種書，常常遞經許多人的傳抄或傳刻，由於抄刻或校書的人，學識高下有優劣之分，態度有謹慎疏忽的不同，於是同樣一種書本，經過若干次的翻刻或傳抄，便有優劣的不同。譬如有的本子錯誤少，有的本子錯誤多，有的本子是足本，有的本子則是殘卷，錯誤少而又是足本的書，便是好的版本。錯誤多又是殘缺的本子，便不可靠，就不是善本。如果以宋代的版本為例，浙刻本大都都在杭州雕版的，杭州校勘寫雕印刷的專業人才較多，經驗也足，所以出版的書最精。蜀刻本，是四川地區的出版品，四川自唐以後，印刷業即很發達，文化水準相當高，所以蜀本也很精美。至於閩刻本，多半是出於福建建陽、建安等地的書坊，這些書坊以盈利為目的，所以閩本就差一點。我們讀古書時，如果同一種書，有宋代的浙本、蜀本、閩本流傳，當然要選擇浙刻本為佳了。

讓我們再舉出幾個實例，以印證讀書選擇版本的重要。

據宋代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裡記述這麼一則故事：北宋時期，杭州府學有一位教授，有一次出易經題目考學生，題目：「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考生看題目後，面面相覷，茫然不知如何下筆作答。有位考生舉手提出請求說：「題目不明，能否請老師稍作解釋。」這位命題先生拉長了臉說：「這是經義，在考試時，不能解釋。」學生又說：「如果參加公試當然不敢上講，如今是私試，恐怕無妨吧！」於是老師便講解了題目的大概內容。這時有位考生，拿出了一本國子監刊刻的易經說：「老師恐怕是看了錯誤最多的福建麻沙

地區坊間出版的本子吧，國子監刻本是坤爲釜。」這位出題老師紅著臉，無限羞愧的說：「我題目有錯，當罰。」於是便罰另改題目。從這則故事裡，可以知道，如果那位杭州儒學教授會選版本，不依據當時的閩本而改用國子監刻本，便不會鬧出這種笑話來。又如水經注一書，清朝初年的人所讀的都是明嘉靖以後的刻本，錯字多得幾乎沒法子讀，後來戴震用永樂大典校對的結果，共補了明刻本所缺漏的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去了妄增的一千四百四十八字，糾正了臆改的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短短的一部水經注，竟有七千字以上的錯誤，叫人怎麼去讀，所以要研究水經注的話，就應該以戴震的校刊本爲主，少用萬曆十三年吳琯刻本和萬曆四十三年李長庚等本子。再以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南宋初年刊本劉賓客文集爲例。該文集現存世的宋本，尙有二種，一爲東瀛崇蘭館藏本，一爲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瞿氏藏本僅殘存首四卷，著錄於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及書影，爲南宋蜀刻本。崇蘭館藏本，即是民國二年武進董氏誦芬室以珂羅版據以覆印的，商務印書館又從董本影印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通行較廣。以該本的刻工判定，似應爲浙江刊本，蓋爲三十卷外集十卷。此宋本與故宮藏的宋本，除外集十卷爲皆據宋敏求輯本相同外，其他地方則大有出入。譬如文集編次有不同，故宮藏本先文後詩，崇蘭館藏本則先詩後文，而兩本各體所收的詩文及篇次先後亦不盡同，如崇蘭館藏本雜著七篇，故宮藏本題爲論，又如澤宮一篇，崇蘭館藏本列入古詩，故宮藏本載入雜說。如果再以故宮藏本校崇蘭館藏本，又會發現除編次不

同外，文字更有許多互異的地方，像崇蘭館藏本卷第三十葉途中早發詩云：「曉士應高枕，無由知姓名」句，故宮藏本「由知」作「人間」；又崇蘭館藏本卷第五第七葉武昌老人說笛歌云：「高聲五言隨指發」句，故宮藏本「高」作「商」；再如崇蘭館藏本卷九第七葉第三行有「江上春來新雨晴」句，故宮藏本「春來」作「朱樓」，像這種例子太多了，無法詳加標舉。同時兩本的音註也互有詳略，可以互供校補。像這樣的例子，如果我們在讀書之前，對這本書傳存的古代若干本子的特點能有所瞭解，那麼應用其書中的資料，豈不又方便又正確嗎？所以讀古書應該注重版本的選擇，是毫無疑問的真理。

三、圖書編目注重版本的發展情形

歷來的讀書人，多半喜歡藏書。家裡藏書多了，爲了檢尋方便起見，便有書目的編纂。有了書目，不但可以按目搜書，而且藏書量也容易確定。最早的藏書，大半只記載書名、卷數，頂多加上作者或刻本、抄本及版刻的時地，這些粗枝大略的記載，無法顯示好書的價值。到了明朝中葉以後，便有人仿照書畫賞鑑的體裁，撰寫專門注重賞鑑方面的書錄。可是，這種書錄與古代敘錄撰寫方式不合，它不注重書的內容或作者，只論及書的本身。例如繕寫的工作，刊刻的好壞以及遞藏源流等等，純粹以審鑑與欣賞的態度爲主，錢謙益的讀書敏求記，就是很好的例子。錢氏將家藏書中最精華的

挑選出來，每一書寫一篇解題，編成述古堂書目題詞，後來改名爲讀書敏求記。自此以後，風氣愈爲盛行。到了清乾嘉時期，隨事增華，于敏中、彭元瑞等先後奉敕編撰天祿琳琅書目正續編，又進一步，於記載書籍刊刻年月以及刻印優劣之外，再把書中的收藏印記與名家題記等，詳細收錄，有時的還考訂他們的生平。這種風氣一開，當時人便紛起效法，以後，流衍愈廣，體例也就更加詳備。凡是各書的版式、行款、譌字、牌記、序跋、紙質、墨色、字體等等都加以詳細敘述。但是，這樣的記載，還是以書的外形爲對象，雖然對版本的考訂鑑別有幫助，猶不能脫離賞鑑的習氣。所以後人又加發展，於賞鑑文字之外，又能模仿古代敘錄的方式，介紹作者的生平，闡釋書中的大旨，甚至於能將同一種書的許多流傳版本加以校勘，並附列校勘記，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藏園羣書題記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古書編目發展到此，它的本身除了賞鑑功效之外，又真正能幫助讀者瞭解書中的內容及長處，對於治學的人，真是裨益良多。

現代的圖書館，藏書數量極多，撇開現代人的作品及翻譯的歐美等圖書不談，單就古代書籍而論，有的圖書館收藏古書至多，像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就是例子。這些收藏的古籍，典藏的意義之外，最主要的是希望學術界能善加利用，以達到發揚文化的目的。於是爲方便學人使用，首先便要有書目的公佈，這些書目的編纂，限於篇幅、人力、時間等因素，勢必無法像一些藏書家所編的目錄一樣，附上詳盡的書志。於是編目便以注明卷冊數及作者

爲主。但是前面說過版本對讀書人利用圖書至爲重要，尤其是我國地方大，歷史久，同一種書往往在不同的地方及時間經過許多次的翻印，因而流傳的版本常有好幾種。這些書在刊刻時，常因刻書的人校勘態度有謹慎敷衍的不同，造成傳本有善與不善的區別。例如刻書的人，當時所據的本子，有的不是足本，認真負責的人常會加以補足，馬虎的人，則往往不找其他的本子補足，就照刻了，有時甚至於改頭換面來掩飾原有殘缺的痕跡；又有因所據的原書脫漏謬誤甚多，根本不改。所以不同的版本，在內容上，有時會有很大的出入，如果在目錄中，不能將版本的時地作一個明確的交待，別人就無法瞭解這本書的好壞。所以近代圖書館的目錄，於古書多半注明一書的版本，這樣來配合我國圖書分類法則，將同一類中的某一本書，排列在一起，然後按其刊刻的時間先後部次，於是某個圖書館中到底藏有那些本子，便可一目瞭然。讀者就可很方便的利用目錄中的版本去查檢歷代書目中的書錄，對於該本書內容上的優劣所在，即可很快的知曉，所以現代藏有古書的圖書館，其藏書目錄，可以說都有版本一項的交待。

四、如何審訂古書的版本

圖書編目中注明版本一項，對於方便讀者查檢參考方面的貢獻固然可觀，但是如果在版本項目上，不能有正確的交待，則注明版本的功用，不但會消失，還可能貽誤讀者。所

以一位從事古書的編目人員，必須要具備審訂版本的知識，才能稱職。茲就最基本的幾項審訂版本的常識，略予說明，或可供從事古書編目工作者的參考。

(一) 版式行款

每一本書，最大的特徵，便是它的版式行款。所謂版式行款，包括一書的四周界欄、板口、行數以及每行字數等等的特徵。四周的界欄，又省稱邊欄，通常有左右雙欄和四周雙欄兩種，同時有版匡高低及寬狹的分別；板口是一書的板心，有黑口、白口及花口等區分。在板口中通常還有大小字數、書名、卷葉次、刻工、魚尾、橫線等標記；每行字數則有單行或夾行等情形，最常見的是大字單行，小註夾行，偶而也有跨行的例子，除以上這些特徵要記載之外，書中大題、小題、序及目錄等，都要盡量敘述到，才有參考的價值。

歷代的刻書，除了覆刻本之外，版式及行款甚少規律。

但是，經驗多了以後，也約略可以看出各時代的特色，例如北宋本：大體上多是單邊、白口、字大、行寬，而且墨色濃厚，所以給人一種疏朗悅目的感覺。版心上端通常刻上字數，中標書名，下方署刊工姓名。南宋時期，承北宋風氣，惟稍予變化，一般刻書多用雙邊、細字、密行，黑口也漸漸流行。胡元又承襲南宋習慣，黑口本已盛行，尤其是大黑口特多，行界也多半緊密，版心雙魚尾，中縫多半有刻工姓名和字數，同時左右雙欄逐漸變為四周雙欄。到了明代，嘉靖以前還是盛行黑口，字體款式都沿襲元代，尤其是私家刻印的書坊本，更是如此，有時和元版很難區別，只有內府所刻的

經廠本，獨具一格，書型大，版框寬，行界疏朗，字大如錢，多有句讀，而且黑口、雙邊，幾已成爲定式。嘉靖年間，刻書風氣驟然改變，刻書的人爭相模仿北宋時期的白口本，因此黑口本幾乎絕迹，版式幾乎與北宋相同。萬曆以後，黑口本又漸多，黑白兩種書口就常見了。明代後期還盛行朱、墨套印的書籍，多是白口，左右雙欄，中無界行。到了清代，白口、黑口都有，大體上是乾隆以前，白口爲多，嘉慶以後黑口漸盛。以上所述，只是各時代的簡略特徵，其實，行款版式的變化很多，不能依行款版式就驟然判斷爲某時某地的刻本，僅可利用它與歷代藏書志中已記載的行款版式加以比較，做爲審訂版本參考依據的佐證資料。

(二) 牌記

古代刻印圖書，常在一本書中的序文、總目或各卷卷末的空白處，刻上一種形式類似碑牌的標記，稱爲牌記，也叫做木記。因爲它的外圍常用墨欄環繞，所以也有人名之爲墨圍。牌記的作用，是書坊用來標明刻書的處所和時間的，有時也用它來說明版本的良否及雕梓校勘的始末。所以它的功用，與今日圖書中版權葉上註名書局名稱、出版時間以及其他有關的說明文字相當類似。因而牌記是審定一書版本最有力的資料。

牌記並沒有一定的形式。有直書一行、雙行或多行的；也有外加單墨圍、雙墨圍的；亦有作亞形或橢圓形的；更有配上各種花紋或版置的……，可以說品類繁多，變化多種。通常以直書一、二行又外加墨圍最爲常見。例如故宮博物院

所藏的宋嘉定十三年刊本「歷代名醫叢求」一書，其序文後有木記云：「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刊行」一行以及宋鄂州覆刊龍爪本資治通鑑六十八卷之後有雙行木記云：「鄂州孟大府三安撫位刊梓於鶴山書院」，便是最常見的例子。至於元至正間刊本故唐律疏議中有亞形木記曰：「崇化余志安刊於勳有堂」，又故宮藏本元野郡覆刊宋廖氏世綵堂本論語集解卷三尾題後有橢圓形木記曰：「野郡重刊廖氏善本」，這種例子還是常見的。可是像宋王叔邊刻本後漢書中的牌記云：「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並寫作大字侵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傑，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咨。」作五行，文字外圍加簾幕形圖案；明弘治五年刊本大廣益會玉篇的木記，上一橫幅書云：「三峯精舍」，其下配以精美版畫，畫之兩旁有二聯直書，其右曰：「弘治壬子孟夏之吉」，左曰：「詹氏進德書堂重刊」；而明嘉靖三十八年刊本大明一統志的牌記云：「大明嘉靖己未孟秋書林楊氏歸仁齋重梓行」，書作二行，外飾以寶蓮燈圖案，以上這三種多形多姿的形式，例子就不多見了。至於牌記的字體，多半作楷書正字，但也有少數作隸書、篆書體的，例如清道光四年葉夢龍寫閱過齊刊本唐昭陵石蹟考略的牌記云：「道光甲申二月離子廣州喜閱過齊」，便是用篆體字書寫成的。

牌記置於書中何處，也不甚一致，最常見的是在書前序文、總目、凡例後空白的地方，例如故宮藏本宋麻沙本晉註河上公老子道德經一書，在序文後便有牌記云：「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又元後至元二年刊本資治通鑑綱目書

法凡例後也有木記云：「至元丙子冬續善堂刊本」。除了書前序文或總目之後偶爾有木記外，常有散於各卷尾題附近的空白處，像故宮藏本宋臨安府陳氏刊本常建詩集二卷，書中的牌記云：「臨安府樞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刊印」，便是放在卷一尾題之後。但是一部書通常不止一卷，有時候木記更不規則的散見在若干卷的卷末。前面舉的故宮藏本元野郡覆刊宋廖氏世綵堂本論語集解，就是很好的佐證，序文後有木記，而卷一、三、五、六、七、八、九各卷尾題後面也各有牌記，又各牌記的形式並不一致，有長方形、亞形、橢圓形三種。從牌記不規則的散見於書中看來，在審訂一本書的時候，便不能不從書前到書末，留意的加以檢查了。

牌記的文字，也有詳略的分別，最簡單的只有幾個字，例如宋婺州本周禮注，卷三尾題後的牌記僅「婺州市門巷唐宅刊」幾個字而已。可是蒙古定宗四年張存惠雕明軒刊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書中的牌記，文字竟多達二五十一字，其內容除出版時地外，對書名及該書的長處，也略加敘述，茲將文字逐錄如下：

「此書世行久矣，諸家因革不全。今取證類本尤善者為案，增以寇氏衍義，別本中方論多者，悉為補入。又有本經別錄先附分條之類，其數甚多，差至，今亦考正。凡藥有異名者，取其俗稱，注之目錄各條下，俾讀者易識。如委休云骨何卑，假蘇云荆芥之類是也。圖像失真者，據所當見，皆更寫之。如竹分淡、苦、薑三種，食鹽若古今二法之類是也。字畫誤，殊關利害。如什斗、

通症、上下、千十、未末之類，無慮千數。或證以別本，實以諸書，悉為釐正，疑者闕之，敬俟來哲，仍廣其奔行，以便緘緝，庶歷久不壞，其間致力極意，諸所營制，難以具載，不敢一毫苟簡，與舊本頗異，故目之曰重修。天下賢士夫，以舊鑒新自勉矣。泰和甲子下巳酉冬日南至晦明軒謹記。」

牌記在最早之時是書坊刻書標明處所所記號，以後漸漸繁衍，文字的內容遂不止一端，所以牌記在審定古書版本之上，它的貢獻，至少包括下列幾項：

1. 藉以考知刊刻處所

宋版文選五臣注書中有牌記云：「杭州緇兒橋河東岸開牋紙馬舖鍾家印行」；又宋版後漢書注書中牌記稱：「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像這些牌記中的文字，非常明顯的指出刻書的處所。

2. 藉以判定梓行時間

宋版漢官儀書中有牌記云：「紹興九年三月臨安府雕印」；元刊本資治通鑑綱目書法一書凡例後有長方形牌記云：「至元丙子冬積善堂刊行」。牌記中的文字，除了註明刻書的地點之外，刻書的時間也昭然可見。

3. 藉以想見一書的版式

宋慶元間建安刻本附譯文尚書注疏中有本記云：「魏縣尉宅校正無誤大字善本」；宋刊本新編近十便良方書中本記云：「萬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檢用，請詳鑒。」從牌記中文字可以想見刻書的字體及行款。

4. 藉以略知書本內容

宋麻沙本纂圖互注揚子法言，書末有牌記云：「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注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茲無訛謬，願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為益之大也，建安□□□謹咨」；宋刊本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目錄後有牌記云：「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近求到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磨繕木以廣其傳，幸學士詳鑒焉，乾道端午識。」牌記中說明了所刻書內容、卷數等情形。

5. 藉以審知據何本雕梓

元刊本論語集解序後牌記云：「肝郡重刊廖氏善本。」一望而知是覆刊宋氏世孫堂本。又如清嘉慶十八年黃氏士禮居刻本論語音義書中牌記云：「孝經今文晉義各一卷，香嚴書屋藏汲古閣影宋鈔本，士禮居倩人影寫重雕，癸酉新秋工竣並記。」明白指出此書係影刻汲古閣鈔本。

6. 藉以明瞭出賃及刻書者姓名

書中記載刻書者較為常見，而載明出賃者姓名的則以佛經書籍最為常見。如明萬曆二十五年徑山藏本中之石門文字禪書中有本記曰：「丹陽居士賀學禮、學易共施刻此卷，薦父澹庵府君往生安養。海鹽了緣居士對，長洲徐普書，上元李茂松刻。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7. 藉以辨明係活字版印刷

如明嘉靖三十一年芝城銅活字藍印本墨子卷八尾題前有牌記云：「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季夏之吉芝銅板活字」。讀者一覽可知係銅活字本。而明麗澤堂活字本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九十末的牌記云：「麗澤堂活板印行，姑蘇胡昇繕寫，章鳳刻，趙昂印。」更進一步標明寫刻活字及印刷者姓名。

8. 藉以判別官私刊本

本記多半是坊肆刻書的記號，以私家刻書最常見，官刊圖書雖不多見，但並非全無例外，如宋臨安府刊本漢官儀一書中有牌記云：「紹興九年三月臨安府雕印」。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書之牌記也說：「大抵此類本記牌識，見於坊肆刻本爲多，其近於官刻者，有宋刊本胡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八十卷，目後刻有長木記四行云：「時淳熙壬寅中夏既望，刊修於州治之中和堂，奉議郎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正簿賜緋魚袋胡大正謹識。」

9. 藉以查明校勘情形

書刊校對精審，對讀者幫助良多，所以坊肆刻書，常在牌記中明言其書校刻情形，以增加書的價值。當然坊肆的說法未必可盡信，不過我們也爲之舉例。宋紹興二十二年臨安府榮六郎家刻本抱朴子卷二十末有牌記云：「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五南街東，開印輪經史書籍舖，今將京師舊木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事，事君子賜藻鑒。」

紹興壬申歲六月旦日。」；又如宋紹熙二年余氏萬卷堂刊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書中牌記云：「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不全，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含作吐，召公作邵桓，四作曰，蒐作瘦，若此者衆，皆不敢臆見更定，姑兩存云，以俟知者，紹興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說明了刻書詳校之後，於異同處不敢詳斷，尙留待方家考定。

10. 藉以說明書的完整性

古書常分若干集，或若干卷，釐卷固有不同，而分集亦未必一致，因而梓行時間的先後，釐定卷次常有出入，所以坊肆也曾強調其書的完整性，例如宋龍山書堂刊本揮塵錄，在餘話總目之後牌記云：「此書浙間所刊止前錄四卷，學士大夫恨不得見全書，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帙，目錄條章無遺，誠冠世之異書也，敬三復校正鐫木，以衍其傳，覽者幸鑒，龍山書堂謹啓。」

11. 藉以審知是否附圖及評點

書中附圖及名家評點，也常在木記中標明。如元大德五年王常刊本王荆文公詩箋註書中牌記云：「僕頃聞詩於須溪先生及中山，則恨李註本極少，於是先生出示善本併得其評點，茲不敢私，命之梓，期與四方學者共之。門人王德盛題。」又明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註釋西廂記書中牌記曰：「嘗謂古人之歌詩，即今

人之歌曲，曲曲雖所以吟咏人之性情，蕩滌人之心志，亦關於世道不淺矣。世治歌曲之者，猶多若西廂曲中之翹楚者也。況聞閨小巷家傳人誦，作戲搬演，切須字句真正唱與圖應，然後可市井并行，錯綜無倫，是雖登壇之意，殊不便人之觀，反失古制。本坊謹依經書重寫繪圖，參訂編次，大字魁本，唱與圖合，使寓於客邸，行於舟中，閒遊坐客，得此一覽始終，歌唱了然，爽人心意，金銀梓刊印，便於四方觀云。弘治戊午季冬金台岳家重刊印行。」

12 藉以探知是否補刊

牌記除了幫助審刻一書原刊時地外，有時還可以從之探知其補刊的情形。例如故宮藏本的宋淳祐十年福州路提舉史李溫刊本國朝諸臣奏議，書中卷八十二及一四七末都有牌記云：「福州路儒學教授劉直內命工刊補。」可以探知此書有一部分係經過元代修補刊行的。

善本書中的牌記，對於審定一書板本上的功用，大抵已如上述，固然有些書中的牌記，其文字內容奇特怪異，但極為罕見，故不再詳為列舉。

牌記之有助於鑒定板本，從上述文字中，已約略可以想見。今後如果能將歷代版刻中的牌記加以整理，從之列出書坊的名稱、地點以及時間，對於研治板本及編目者來說，是極有幫助的事。從前日本出版的書誌學期刊第一卷第三號及第五號中，登錄「宋朝私刻本考」一篇文章，其內容就是從牌記中將宋代書坊名稱，依文字筆畫多寡排列，並載明各書

坊所刻圖書，極方便檢尋。不過，今日藏書分散，藏書的數量也有限，要對牌記做完整的收集，似乎不太容易。所幸的是，現在已將歷代藏書志泰半出版行世，而諸藏書志中也常詳載牌記名稱，所以還是有蹤跡可尋，值得一作的。

此外還要強調的是，牌記固然有助於審視一書的版本，但是許多古書中，並無牌記，所以牌記並非是審定板本唯一的資料。一本古書中的序跋、行款、字體、刻工、題識、紙質以及墨色、藏書章等等，無一不是治板本學的佐證資料。同時要特別留意許多覆刻本的圖書，通常將原書的木記依原式加以影刻，所以利用牌記時要特別審慎。還有少數的書估或藏書家，常為了提高一書的價值，不借作假，將書中牌記挖去，或從別本書中取下木記補鑲到書中，或另刻一牌記補配在書中以冒充宋元版書，而其做偽的功夫，常是鬼斧神工，如果不細心加以辨別，常常造成錯誤，利用牌記來斷定版本，是應該謹慎從事，不可輕心大意的。

(三) 刻工

所謂「刻工」，就是當日參與刻書的工匠。古代刻書，多半聘請熟練的工人雕版，這些參與刻書的工人，習慣在他們所刻的書葉間留下自己的姓名，這種舉動，一方面是對刻書表示負責；另一方面是古代刻書通常按所刻數量計酬，假使一部大書，參加雕版的工人很多，零星支付工資必不甚方便。因此，刻工在所刻書葉留下自己的簽名，待書印成以後，便可依各人刻雕的多寡，取到應得的工資。至於刻工簽名的地方並不很一致，最常見的是版心的下端，偶爾也有在版心

的中間或上方，少數的還有簽名在版葉前後端的下方。

刻工留下自己簽名的習慣，從什麼時候開始，已不可考，後晉開運年間所刻的天王像，還保存着當時刻工雷延美的名字，可知刻工有留下簽名習慣的歷史，是相當久了。由於人類生活的歲月有限，而且古代遷居的情形比較少，所以刻工漸漸被做爲審訂古書版刻時地的重要資料。自晚清民初以來，許多藏書志裏都有刻工的載錄，例如：王文進文錄堂訪書記，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傳增湘藏園羣書題記，中央圖書館宋金元本圖錄以及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等等，都是明顯的例子，而日本書誌學專家長澤規矩也更進一步的編成宋元刻工表，表中依刻工的時代及姓名筆畫多寡爲排列，極方便檢尋。究竟刻工對審訂版本方面有什麼幫助？我們先以故宮博物院珍藏元代刊本資治通鑑爲例，略加探討。

故宮所藏元刊資治通鑑係元胡三省注本，每半葉十行，行二〇字；版匡高二一公分，寬十四·九公分，版心黑口，中縫雙魚尾，書前附有至元二十二年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歷來藏書家據元史百官志說：「至元二十七年，立興文署，召工刻經史子版，以資治通鑑爲起端。」乃定此書爲元興文署刻版，而且相沿甚久，沒有異詞。其實，故宮博物院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也收錄資治通鑑一書，據提要得知根據內府藏本抄錄，疑即爲天祿琳瑯書目前編著錄之元刊本，其書已於嘉慶間燬於宮火，無法考見，然而根據其著錄的文字，可以推斷與現在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元刊本版本相同。而四庫提要却引用明黃溥簡籍遺聞說：「是書元末刊於臨海，洪武初，

取其版藏南京國學。」首先提出元末浙江臨海刊刻過胡注資治通鑑一書。民國初年，王國維先生又根據明朝黃氏的話，說得更爲詳細：「興文署之立，未知何年，然秘書監志言至元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太保大司農奏過事內一件，興文署掌雕印文書，交屬秘書監呵，是至元十年已有興文署，而是年署中已有雕字匠花四十名，印匠一十六名，則刊刻通鑑，當在是時，而胡梅磴通鑑成於至元二十三年，王磐致仕，亦在至元二十一年以前，且王氏序中無一語及梅磴，則與文署所刊，王氏所序，自爲溫公原書，非胡注也。梅磴自序初撰通鑑廣注九十七卷本，用陸氏經典釋文例，與本書別行，丙子避地越之新昌，失其書，亂定返室，後購得他本爲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案丙子即宋亡之歲，梅磴丙子後購得之，蓋即興文署本，即注於是本之上，後來刊注時，遂並王磐序刊之，實則與胡注無與也。明黃溥簡籍遺聞，謂是書刊於臨海，洪武初取其版入國子監，此語得之，臨海爲梅磴鄉里，與樂平州刊文獻通考，慶元路刊玉海事同，當在梅磴身後矣。」（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十一）王氏直接否定興文署曾經刻過胡注資治通鑑，再一次強調是臨海刊本，這裏，就從此書的刻工來探討。

胡注資治通鑑是一部大書，葉數極夥，參加的刻工可知有的有：吳升高、吳昭甫（或昭甫）、吳生老、吳可久、吳進、吳可九、吳己、吳什安、吳華、王伯玉（或伯玉）、王仁甫、王仲仁、王智夫、王子興、江天其、江淑度、江四如、江安民、江壽卿、江志高、江志、江清、江實、江梅溪、江成、